

【短史记】

古人爱玩诗歌游戏

□纪习尚

“一只盛饭的瓷碗，可以写上脍炙人口的风雅唐诗；一副卧床的锦被，可以题上几句寄托遥深的诗句。”在国学大师钱穆看来，中华民族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。他说得没错，从诗经到楚辞，从唐诗到宋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诗歌的浸润中长大的。它既是抒发豪情、寄托壮志的载体，还是烧脑又有趣的游戏。出于对诗的热爱，古人发明了许多和诗歌有关的游戏。

“唱和”可能是最早的诗歌游戏，它形式简单，一人作诗，他人也以诗应答。《尚书》中记载了远古时期，舜帝和皋陶之间君臣唱和的故事。舜帝首先唱道：“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”皋陶继而相和：“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！”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诗歌唱和。

到了唐代，唱和更是蔚然成风。《唐诗纪事》里说，唐中宗李显每当有所感触的时候，就会起笔赋诗，修文馆的学士几十人，都会写诗应和。庙堂的这种风雅，让当时的人们很是羡慕。宋代，太宗赵炅在位时，常和臣子们玩唱和游戏。而且，为了检验他们的才学，太宗还增加难度，出一些艰僻难押的“险韵”。大臣们和不出来，只好“上表乞免和”。看到臣属们认输，宋太宗估计也会偷笑吧。

上行下效，朝廷推崇的，民间也纷纷模仿，唐人就有“一闻天乐唱，恭逐万人和”的记述。白居易、元稹之间友谊长久，两人的唱和诗达到千余首，人称“元白”。可以与“元白”媲美的，是皮日休与陆龟蒙的“皮陆”组合，两人也是在用生命玩唱和游戏。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两人围绕茶、酒、花、石等日常事物，抒发闲情逸致，唱和656首，编成了《松龄集》十卷。

游戏就是“戴着镣铐的舞蹈”。在重重的限制之下，仍能抵达预设的目标，正是它的迷人之处。为了增加对抗性、紧凑性，后来诗人们又发明了“联句”：每人作诗一句或多句，联合几个人的句子，形成一首完整的诗，参与感和现场感一下子提升了。

唐代，有才情的诗人如云，自然不会冷落了联句这个新游戏，《全唐诗》就收录了多位诗人的130多首联句。其中，第一首是李白领衔，高霁、韦权舆参与的《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》，第二首则是杜甫、李之芳、崔旻等的《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》。

唱和与联句，都不需要游戏道具，后来有一种需要“牌”才能玩的诗歌游戏，叫“韵牌”。明代人屠隆编著的《文具雅编》中，记载了韵牌的玩法：将平声韵部的30韵，刻在纸牌上，每韵一张，共30张牌；游戏时，每人抽取一张，按照牌上的韵作诗一首。为了增加趣味性，有时还会添加一些限制，比如指定题目、指定韵脚所用的字等。

明末清初小说家董说，是韵牌的深度爱好者。他的诗集中，有专门一卷《斗韵牌编》，收录了斗韵牌所作诗歌79篇。董说不仅和朋友玩，还和家人切磋。有一年的除夕，他与家人斗韵牌，分到了“交、梢、庖”三韵，作了五绝一首；正月初一，他和儿辈们斗了至少三次韵牌；初四，他和晚辈们喝茶聊天时，又斗了几次，这次用的是四韵。韵牌成了家庭团聚时的好游戏。

在韵牌的基础上，又出现了限字的“诗牌”游戏：玩家要在分到的几十个字中，凑出一首诗来，难度比只限韵的韵牌又进了好几层。如果拿多巴胺和内啡肽作比较，古人这种字斟句酌的诗牌游戏更像是在“追逐内啡肽，远离多巴胺”。经过长时间的左支右绌，突然间拼

出一首好诗，体验到的就是内啡肽的快乐。

游戏所用诗牌，是用竹、骨、纸等制成的小方块，长宽约2厘米，厚约0.2厘米。一面刻字、一面空白，每张牌刻一个格律诗中经常出现的字，平、仄各一半，以不同的颜色区分。一副牌可以有不同的张数，少到两三百，多到近千，分装在不同的盒子里。玩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分牌法，将牌一次性分完；一种是摸牌法，摸进一张，再打出一张自己不需要的牌。不管哪种玩法，目标都是用自己所得到的字，又快又好地拼出一首完整的诗来。

诗牌游戏在明清很流行，文人聚会时，往往会拿出几盒诗牌，比试一番。明代人祁彪佳在《甲乙日历》记载：一天雨后，他和几个朋友小酌，为了增加酒趣，众人斗起了诗牌，一番苦思之后，“各粘诗牌，成五律一首”。祁彪佳用的很可能是比较轻薄的纸质诗牌，所以才有“粘”的说法。而据清末郭嵩焘日记，他与八九个朋友举行冬日“消寒会”时，经常以斗诗牌为乐。玩时，每人分诗牌一盒，每盒100字，平仄各半，用这些字直接在牌盒里拼出诗句。

诗牌游戏的道具和玩法与后来的麻将有相似之处，有人说它就是麻将的前身之一，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只不过麻将上刻的是图案而不是汉字，要拼凑的是花色数字的简单组合而不是诗罢了。

以上这几种游戏，都需要完成一首或多首完整的诗，游戏周期比较长。后来又出现了节奏更快的“诗钟”。聚会时，任选两个意义不同的词，或分咏、或嵌字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“两句十四字”一联，写得又快又好的获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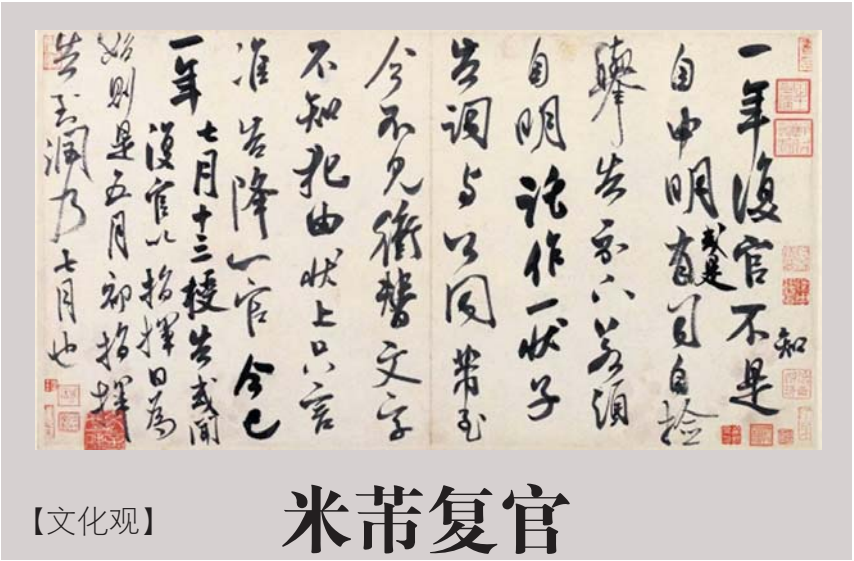
之所以叫“诗钟”，是取“钟声响，诗句交”之意。游戏开始时，取一条丝线，下端缀一枚铜钱，中间系一支点燃的线香，置于金属托盘之上。一段时间后，线香燃断丝线，铜钱掉落在托盘上，发出一声脆响，就表示要交卷了。

诗钟有两种玩法，一是“分咏”，以所给的两词为题眼，分别在上句和下句中咏出它的意象，但题目中的字绝对不能出现。比如“旧账簿”“美人蕉”，有人对“流水不堪思往事”“春风犹自卷芳心”。

第二种是“嵌字”，难度更大些，需要将题目中的两个字，嵌在上下句的指定位置处。嵌在第一字的叫“一唱”，以此类推，直到“七唱”。溥仪的师傅陈宝琛是打诗钟高手，一次聚会上，他抽到“天”“我”两字，要求作“五唱”，也就是把这两个字嵌在句中第五字。他沉吟片刻，写下“海到无边天是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”，被公认为是难得的佳句。

诗钟的对抗性强，花样很多，妙趣横生，很受人们的欢迎。特别是“文酒会”上，在座的每人在几张纸条上各写一字，团起来放在托盘之中。之后每人随机拈取两个纸团，以纸团上的字为题，限时作两句诗，钟响后作不出诗的要被罚酒。

除此之外，酒令也值得一说。“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”，宋代的《蔡宽夫诗话》这样评价唐朝“酒令”的流行。白居易有“闲征雅令穷经史，醉听清吟胜管弦。更待菊黄家酝熟，共君一醉一陶然”的诗句，描写他和朋友饮酒时行“雅令”，为了做出好诗句而搜肠刮肚，醉后仍意犹未尽，相约秋天时再次相会。清代俞敦培编著的《酒令丛钞》，将酒令分为古令、雅令、通令、筹令四大类，三百多种。和诗有关的就有即席赋诗、四色诗、数字诗、干支诗、改字诗、花名诗等，种类很多。这些游戏都是我国诗歌文化的一部分，值得我们去探究一二。



□石念军

习书以来，时有临摹米芾行书《复官帖》。冥冥之中，每一次的临摹都像是参与一场像与不像的拔河竞力，力图接近书写者的当时心境。

米芾素有疯癫之名，其书亦然。墨色清浅而笔法跳宕的《复官帖》，正是其代表作之一。笔画的起承转合宛如醉拳，时而左右摇摆，时而前仰后合，表象凌乱，而终有颠扑不倒的卓然之姿。

日复一日反复临写之中，我愈发好奇：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给谁写下了这样一封既喜又未免哀怨的信札？

自魏晋以来，中国书法始于技法，而归于抒情。几乎所有传世的墨迹，都被视为书者的旷世陈情。作为集古成今的承前启后者，米芾虽不曾达到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、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的高度，却也是后来书者绕不开的一座书学高峰。

却道是世人只知米芾疯癫，不识其毕生渴求而终不遂愿的“官迷”一生。

这是崇宁三年，即1104年。据周兴禄《米芾研究》一书考证，此前一年的三月，时年52岁的米芾从“蔡河拨发”一职转任太常博士，掌管祭祀奏乐等。相比“拨发”这一督促漕粮货物的差事，太常博士一职虽则清闲，却显高贵。对于18岁从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入仕的米芾而言，无疑是一个更值得欣喜的岗位。然而，米芾的快乐似乎总是更短一些。太常博士任上仅仅两月有余，米芾便又一次因为个人癖好而遭到弹劾。这个癖好就是洁癖，具体症状乃是反复清洗官袍，以致雍容华贵的朝服不出俩月便毫无颜色，更显破旧。在那个以仪式与仪表为纲的朝堂之上，如是米芾被非议和被诟病是显而易见的。弹劾声下，米芾很快就被“准告降一官”，谪贬为一任闲差。

《蔡志》记载，米芾此后“已而出知常州，不赴，改管勾洞霄官”。洞霄官在杭州，因不必到任，米芾东归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。在这里，他栖身声名遗世的“宝晋斋”，日夜与书画为伍，写下了诸如《弊居帖》等一大批传世佳作。

书画固然可以传世，却远非米芾一生求索的全部。虽然醉心诗文书画的时间里，他已然闻名遐迩，不仅得到了王安石的赞许，而且与苏轼、黄庭坚互为知己故交。彼时的士子情怀，终究逃不脱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仕途囚笼。也正是因此，当他在崇宁三年五月，在闲居的润州意外收到复官的消息，提笔而作《复官帖》，欣喜之余也禁不住抱怨坏消息来得不明不白而好消息来得未免太晚。

遗憾的是，我查了很多资料都不曾查证这封信札究竟是写予谁人——“告词与公同”，此“公”想必与他有着相似的挫折，也大概是他性质相投的朋友吧？

研读米芾的传世书法，我曾经臆想，究竟是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，才能写下如此跌宕起伏的传世经典。当我沿着其法帖文字，慢慢读了关于他的诸多生平逸事和奇闻异事，内心开始隐隐感

觉到：外表疯癫的米芾，应该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吧？

米芾因母亲曾是皇帝乳母的缘故，18岁承蒙皇恩入仕秘书省校书郎也就是官廷校对，从此走上了与祖上世代武将截然不同的仕途之路。对于米芾而言，这样的恩宠自然是一种机遇，遗憾的是，如此因缘际遇也最终成为其仕途进击的阿喀琉斯之踵，乃至一世不得释然的心结。

当然，对于米芾而言，崇宁三年的这番复官，虽则算不上什么好差事——无为（地名）知军，也就是作为中央派员暂时主持地方军队和民政事务。依其此间创作存世的《真帖》《蒸徒帖》《张大都帖》行文鲜有民生痛痒的记录判断，相对于行走官廷的角色，此职断非米芾喜欢和善任的。但仕途至此，米芾很快就要走向他朝思暮想的“朝登天子堂”之境了。

如果米芾身后有知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悔恨曾经有过这样一位贵人相携？此人不是曾经将他的诗文佳句写上扇面的王安石，也不是彼此互为知己的苏轼、黄庭坚，而是奸相蔡京。

《五总志》载，米芾曾经寄言蔡京：“后当为相，慎勿忘微时交！”及至蔡京入相，米芾乘船入京，入室大拜并赠诗曰：“肉眼通神四十年，侯门拖袖气如烟。符离径过无行李，西入黄门索相钱。”布衣之交、文艺同好的陈年旧情，终究未能摆脱势利相倾的俗套。

无法回避的是，米芾的仕途巅峰正是得益于蔡京。崇宁三年初，朝廷设书、画、算学。彼时，蔡京乃当朝首辅。当代书法家曹宝麟考证认为，设置书画博士正是蔡京有意为日后米芾进京而设。此论或有非议，但就在次年，米芾入京，获任书画学博士。作为书画同好的徽宗赵佶，宰辅蔡京、博士米芾，从此携手登台，演绎出一段一段关于诗文书画的爆笑逸事。

米芾毕竟是一真才人。他在《书戒》中写：“至于晚节末路，身名并丧，无以见祖先于地下。”悔过之意，溢于言表。

可那仕途之高处，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清心寡欲？书画学博士米芾以及此后的礼部员外郎米芾，一再以诗献谏、以癫取宠、贪好赏赐，终损士行，而遭弹劾。

弹指间，灰飞烟灭。米芾穷其一生的仕途，终成其人格隙缝里的污垢。而臆想起来，官廷之上，他那么努力地装疯卖癫，大概也是源于无科考功名的害怕和以亲入仕的自卑吧？

距离写下《复官帖》不过3年，再遭谪贬出京的米芾已然遁入仕途的末路，再无回天之机，更无回天之力。史载：大观二年春，米芾上章谢事，不允，三月卒。

米芾时客淮阳。生前的他并不甘心。除了求助老友蔡京，更曾写下《辩癫帖》自辩，先后求助于十余人。然，朝廷内外的群情共识之下，已然于事无补。一代书画宗师，终以落魄仕子的身形孑然离世。

再回首已然千年。一纸《复官帖》，何止是书者历经的一次起伏，俨然是其宿命的缩影。